

白石村遗址与胶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 杨治国 田吉正

胶东半岛大部分地区为丘陵地带, 河流较多, 海岸线较长, 靠近沿海和河谷地带, 有地势低洼和河水易于泛滥的胶莱平原, 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为了探索半岛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文物工作者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工作, 其中尤以白石村遗址的发掘最具有典型意义, 因为白石村遗址的发掘为半岛地区新石器时期早期文化的发现及发展序列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然而迄今为止, 由于学术界对该考古文化尚存在着不同的认识^[1], 因此本文拟就相关问题试作分析, 不当之处, 希望得到专家的指正。

—

胶东半岛历史悠久, 早在一万年前, 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了。1974 年秋, 烟台地区文物管理组在蓬莱村里集西侧的一个山坡的黄土层中, 采集到 2 件打制石器, 并在附近的石门口村的西山谷中发现了 2 块化石, 经初步鉴定, 分别为人的股骨和幼鹿颌骨^[2]。1988 年, 在长岛县又发现了一个古人类的头骨化石, 经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贾兰坡先生初步鉴定, 认为此化石距今 3 万年左右, 有关专家称其为“长岛人”, 这是目前半岛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化石^[3]。进入新石器时代, 这里的原始文化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1963 年山东省博物馆试掘了蓬莱紫荆山遗址, 发现了龙山文化叠压于紫荆山一期地层关系^[4]。1972 年文物调查时发现了白石村遗址。白石村遗址位于芝罘区西南金黄顶北麓的坡地上, 遗址的东、西、南三面层峦叠嶂, 北瞰芝罘湾, 顺山势形成南北长约 150 米、东西宽约 140 米的贝丘遗址, 总面积 21000 余平方米。1973 年烟台地区文管组进行了勘探和复查, 1975 年山东省博物馆和烟台地区文管组联合进行了第一次试掘烟台白石村和荣成河口遗址, 都发现了早于紫荆山一期的更早的遗存。1980

年 5 至 7 月和 1981 年 5 至 6 月, 烟台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烟台市博物馆联合对白石村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 又发现了早于福山邱家庄、蓬莱紫荆山等遗址的早期文化遗存, 称之为“白石村一期”。由于“白石村一期”具有一系列鲜明的文化特征, 以侧三角形足钵形鼎、圆柱形把手的筒形罐等为主要器类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与山东内陆地区已知的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有很大的差异, 与辽东半岛新石器早期文化相比也有很大不同, 与白石村二期相比也有明显的区别, 在许多方面有别于其他的考古文化, 因此, 将“白石村一期”文化单独命名为“白石文化”^[5]。

二

目前, 在胶东半岛一带发现的属于白石文化时期的遗址较少, 仅有烟台的白石村遗址、荣成河口遗址及牟平蛤堆后遗址, 但与山东内陆地区、辽东半岛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及胶东半岛新石器中晚期的文化相比, 白石文化具有它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

白石文化的石器以琢制为主, 兼有打制。器型有斧、镑、铲、锤、球、网坠、弹丸和砺石等。典型器物如: 斧, 多为琢制, 仅刃部磨光, 断面为椭圆形; 铲, 形体一般较小, 均用板岩打制而成; 石球数量较多, 琢制, 直径为 6 厘米左右。

白石文化的骨器一般都磨制得十分精细, 发现的数量也较多, 多通体磨光。器型有镞、锥、针、笄、匕、棒和管等。典型器物如: 镞, 可分为锥形、柳叶形、菱形和三角形等型式, 以前锋尖利、后锋显著后伸的三角形镞最为先进; 针, 可分为大、中、小、三种型式, 最小型的针, 通长 3 厘米, 直径仅 1 毫米, 针眼只有 0.5 毫米, 可见制作工艺之精; 骨笄, 多通体磨制光滑, 以有薄圆形笄帽、周边还刻有纹饰的骨笄最为先进。

白石文化的陶器、陶质均较硬, 以夹砂为主, 次

为泥制,含云母及滑石碎块的少见。较大器物的制作方法以手制为主,采用泥条盘筑法。有的器物内壁如小口罐还能看到泥条盘筑的痕迹,器物表面粗糙。小型的器物一般采用捏塑法。陶器表面以素面为主。由于烧制时氧化不均匀,多数陶片表面呈红褐或灰褐相杂的现象,即通常所讲的红褐陶与灰褐陶,个别陶器的表面略施加陶衣。纹饰主要有附加堆纹、乳丁纹及简单的刻划纹。附加堆纹一般是正面经按压而形成近似索状泥条组合成的宽带状纹式,如波浪形、连续菱形、长直条等,泥条上多压有不规正的凹痕;乳丁纹有的较扁平,有的较突出,形成有圆疣和刺疣纹等纹饰。白石文化陶器的器类较少,形制简单,多直口、圜底器。器型主要有钵形鼎、筒形罐、小口罐、盆、钵等,其中以钵形鼎和筒形罐最富有特点。钵形鼎,多方唇,直口微敛,圜底。口沿外侧往往饰短条斜向泥条堆纹或锯齿形划纹,侧装扁三角形足,形制一般较大;筒形罐,有直口圜底和敛口圜底两种,二者的腹部均置有对称的圆柱形把手,口沿外侧也饰有波形状泥条堆纹;盆,敞口,尖圆唇内收,壁较斜直,腹较深,小平底;小口罐,口甚小,微有肩,最大腹径在中部,多有两个圆泥条做成的桥形耳;钵多敛口、深腹、圜底;陶支座发现的数量不多,未见完整者,从出土的残体看,底呈圆形、实心。鼎的鼎足多呈侧三角形,为白石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筒形罐和部分盆的器身上安有圆柱形把手,此外还有羊角形、钉头形等,此类把手占总数的80%以上。在器身上部置4个或2个圆柱形或钉头形把手最具特色,这也是白石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白石文化的遗迹发现甚少,未见房屋等居住遗迹。在白石村遗址的灰沟中发现有3具零星的人骨架,其中一座为二人合葬墓,根据人骨架排列位置分析,属于非正常死亡。另一座墓葬为一未成年墓葬。二者均未见墓坑与葬具,也没有随葬品及掩埋的迹象,可能是随意扔进而掩埋的。

三

胶东半岛三面环海,仅西面与陆地相连。这种自然的地理条件,虽然限制了原始居民的生活范围,但也促使他们有可能产生自己的文化特点。当然,任何一种原始文化都不会长期独自发展,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展,人口的增多,与外界的联系会愈来愈密切,使同一时期的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影响。

白石文化与山东内陆的北辛文化时代相当,与

主要分布在泰沂山系北侧的小清河、淄河流域的青州、邹平、长清等地北辛文化的遗存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石器多见磨盘和磨棒;陶器多圜底、直口器;常见的纹饰均以附加堆纹、乳丁纹为主,纹饰多饰在器物的口沿部位。同时,在白石文化中数量较多的钵与北辛文化的同类器物的形态相似。但是,二者也有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陶器的陶质、陶色及纹饰等方面:北辛文化以夹砂为主,有少量的夹蚌壳陶,陶色多见黄褐陶,纹饰多见刻划纹,器物的器耳多为横穿孔的竖耳;白石文化陶质以夹云母和滑石为主,陶色以红褐色陶为主,纹饰多见附加堆纹,器物的器耳除竖耳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极富特色的短柱形和钉头形把手。在石器上,如北辛文化多见大型磨制石铲、蚌镰、蚌铲及石磨盘、石磨棒,而白石文化多见石球、网坠。白石文化现存遗址多表现为贝壳堆积,但这种堆积不见于北辛文化。这些差别,说明了两者的生产生活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即白石文化渔猎经济成分较浓,而北辛文化农业比重较大。这足以说明在白石文化时期,与山东内陆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相比,胶东半岛的土著文化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色,与内陆的北辛文化相互影响较小。

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隔海相望,一衣带水,最近距离约110公里。中间庙岛群岛位于两个半岛之间,包括大小14个岛屿,把两个半岛联系起来,这种地理位置给两个半岛的原始文化交流,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白石文化的小磨器与辽东半岛的小珠山下层文化的沟磨石,无论从料到器形都很相似,石球、网坠也大致相同^[9],但是二者之间也有区别,如小珠山下层文化的陶器以夹滑石的黑褐陶为主,纹饰以压纹为主,器类主要是筒形罐;白石文化的陶器则以夹砂红褐陶为主,纹饰以细泥条的附加堆纹为主,器类以钵形鼎为主,二者共存的筒形罐,无论器形还是纹饰,都差别甚大,说明白石文化虽然与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小珠山下层文化有联系,但区别是主要的。它们有自身的文化因素和特点,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

胶东半岛新石器文化是否为本土起源的原始文化?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半岛地区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并不是由山东内陆文化发展而来的,也不是由辽东半岛的文化传播而来的。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适宜的气候及生态条件,内部长期的相对稳定性,这些因素的作用,足以形成半岛地区的

(下转68页)

热心捐资家乡修桥铺路、兴学助教、赈灾济贫等公益事业,这些内容也可以从侨批信件上见到。

侨批业的名称,民间和官方称谓并不完全统一。解放前称之批馆、民信局、批信局、批局、侨信局、侨批局、汇兑庄、信局、银信局、华侨民信局等均属侨批业。解放后政府对该行业进行管理与改造,国内侨批业务已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并入中国银行办理。

如今退出历史舞台的一枚枚侨批已渐渐被人们所遗忘。然而一张张侨批汇款凭证,是华侨移民

史、创业史的真实见证,它存储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侨批并入中国银行,百年来侨批成为了联系华侨、侨眷的情感纽带,也是那个年代我国金融史、邮政史的重要篇章,值得人们去探索、去思考、去挖掘。

本文部分资料引自:《闽南侨批史纪述》(厦门大学出版社)、《闽南侨批史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作者工作单位:福建省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

(上接17页)

本土原始文化即白石文化。白石文化是半岛地区土著居民创造的土生土长的文化,是一种具有独立系统、独具风格特点的文化,是目前已知的半岛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它是本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源头。

白石文化的确立,对于了解和探讨胶东半岛地区史前经济形态——农、猎、渔混合经济形态,尤其对于研究胶东半岛贝丘文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属于白石文化时期的遗址很少,文化层都很薄,并且几千年来遭到后期人们的严重破坏,因此对其文化内涵的深入认识尚有待于今后大量的新的考古资料的发现。届时白石村文化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将得到进一步的揭示和显现。

[1] 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烟台白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7期;

伍人《山东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及相关问题》,《文物》

1982年10期;

韩榕《胶东史前文化初探》,《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

严文明《胶东原始文化初探》,《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

栾丰实《东夷考古》,第82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

[2] 李步青《山东蓬莱发现打制石器》,《考古》1983年1期。

[3] 《山东长岛发现古人类化石》,《光明日报》1988年9月15日。

[4]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蓬莱紫荆山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3年1期。

[5]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县苑城早期新石器遗址调查》,《考古》1989年6期。

[6] 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长海县文化馆《长海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1期。

(作者均系山东省烟台市博物馆馆员)